

论丁玲的“瞿秋白书写”

秦林芳

内容提要 综而观之,在延续半个多世纪的“瞿秋白书写”中,丁玲揭示了瞿秋白作为“战士”和“文人”的双重身份和二重人格。但是,由于在不同时期里所表现出的主体意识和心境不同,丁玲的“瞿秋白书写”多次转移了自己的视点和重心。这显示出了在“政治”与“文学”的张力场中丁玲自我意识倾向的波动和迁移。瞿秋白这个被书写的“他者”,实际上成了人们观照丁玲复杂“自我”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 “瞿秋白书写” 丁玲 意识倾向 复杂自我

秦林芳,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 211171

丁玲与瞿秋白初识于1923年8月。到1932年3月瞿秋白参加其入党仪式,丁玲与之时断时续地接触了八年多时间。因为个人的特殊经历,丁玲从求学时代开始,就认识了不少中共领导人。与丁玲接触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情况相比,丁玲与瞿秋白交往时间不算太长,但是,丁玲对瞿秋白却系念终身。从1929年创作中篇小说《韦护》起到1985年作《早年生活二三事》,丁玲在半个多世纪里一再作了“瞿秋白书写”。综观其整个“瞿秋白书写”,在展现瞿秋白生平行状的过程中,在刻画“瞿秋白形象”时,丁玲揭示了瞿秋白作为“战士”和“文人”的双重身份及其在“政治”与“文学”(作为“情感”之载体和象征)的张力场中所表现出来的二重人格。应该说,这是与瞿秋白的

思想实际相符的。瞿秋白在牺牲之前所作的《多余的话》中,也称自己是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他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同时,自己内心深处仍然有“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这双重意识的存在,决定了瞿秋白在“政治”与“文学”方面的双重生活。政治生活是瞿秋白的理性选择,而与他的天性真正相契合的却是“文学”。他真正向往的是:“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

总的来看,作为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的瞿秋白,其双重身份和二重人格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丁玲从与其结识开始就感悟到了的。但是,在作“瞿秋

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两种文学传统’视野下的丁玲文学道路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A751058)、2009年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种文学传统与丁玲文学道路研究”(项目批准号:09ZWB004)和2010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丁玲传论”(项目编号:2010SJD750011)的阶段性成果。

批评的支点：“继续革命”理论

——文革时期文学批评的语境反思

林 宁

内容提要 文学批评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中国受到了空前绝后的礼遇。这除了文学内部的因素之外,还与其时文学批评所处的语境有关。文革的支点全在于“继续革命”理论。它是发动文革的理由,也是坚持文革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操作实践,也是一种理论形态;是文革时期一切社会活动的纲领,也是文学批评置身之语境和必须遵循的准则。只有采用实证的方法复原历史的时空,才能描述文革文学批评的基本情势,勾勒其运作方式,从而实现“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文革 文学批评 语境 “继续革命”

林 宁,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210023
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 210093

文学批评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中国受到了空前绝后的礼遇。这绝非偶然,除了文学内部的因素之外,还与其时文学批评所处的语境有关。所谓语境,亦即社会思想文化发生的空间和发声的平台。这个空间和平台及至六、七十年代,不仅延续了二、三十年代以来革命文学的惯性,而且愈益凸显文学的反映论、认识论的哲学基础,更加强调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与其它意识形态一起同属于上层建筑,并由此推演出文学批评行为是一种社会活动,它运用文学理论,对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等文学链条或该链条的某些环节进行分析评价,尤其是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思想意义进行揭示,以期影响文学与社会。因为创作者生存于现实时空,作品本身再现社会生活,被文学批评所依据

的文学理论,往往显现思想、政治、哲学等特征。批评主体同作家一样也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面对文学作品或与此相关的文学活动,对其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进行分析、阐释时,必然体现批评家对社会生活的情感态度、理性思考,表现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从而以知识者的身份扮演社会角色,使文学批评带有社会分析和现实评价的特征。简言之,文学批评的对象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社会和现实。如此说来,角色与角色所处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自然成为文学批评研究的首要问题。

那么,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在文革社会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对文革文学和文革现实到底做出了何种分析评价,又是如何开展分析评价的,对文革及其文学产生了何种影响,发挥了什么作用?回

汉宋兼容论的开新及其学术意义

——方东树《汉学商兑》探析

田 丰

内容提要 方东树是嘉庆、道光之际的重要理学家。他恪守以理学为本位、兼容汉学的理念,长期精研汉学,因而既能纠驳其严重弊端,又能认知其卓越成就。针对汉学争夺学术主流地位的倾向,面对清王朝由盛转衰的现实,他在《汉学商兑》中提出以汉学辅翼宋学的构想。这一构想,在具体化、系统性上超越前人,不仅深化了汉宋兼容论的义蕴,且代表理学一派推进学术转型的诉求,是近代儒学重建进程中具有独特价值的成果。

关键词 方东树 宋学 汉学 考据 义理

田 丰,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23

近世以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颇受学界关注。由于方东树以凌厉的气势批判汉学的弊端,多有学者认为该书仅是门户之争的产物,学术价值甚低。近年来,有学者认识到“方东树的主张也非一无是处”,“门户之见并未全然掩盖理性的判断”^[1]。两说相比较,可谓后出转精。但关于《汉学商兑》学术价值的探讨,待申之义犹多。现谨陈浅见,就教于方家。

一、发掘汉宋兼容的学理根据

方东树(1772-1851)青年时期即服膺程朱理学。苏惇元说他“自少力学,泛览经史诸子百家书,而独契朱子之言”^[2]。乾嘉之交,他在钟山书院受业于姚鼐,已明确地归宗理学。嘉庆四年(1799),致书姚鼐,自言“近大用功心性之学”。姚鼐说:“若果尔,则为今日第一等豪杰。”^[3]其后数十年,钻研理学未尝懈怠。道光四年(1824),编订历年著述为《待定录》,自述用力所在,突出“于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体验

甚悉”^[4]。他对长期潜研苦修所臻境界,充满自信;其尊奉理学,因“体验甚悉”而达到坚定不移的地步。

但是,方东树又主张兼容汉学。这是乾嘉时期汉宋兼容思潮浸润的结果。乾隆年间,汉学一派以经、史、小学考据的卓越成就,得以与宋学分庭抗礼,在江南地区甚至取得显著优势。其时,官方学术文化政策由独尊理学转向兼崇汉学。乾隆元年(1736),高宗谕示三礼馆臣,新纂《仪礼义疏》必须“取汉、唐、宋、元注疏诠释,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5]。乾隆十三年(1748),官修《仪礼义疏》成书,汉宋兼容是其基本特色。后来《四库全书》的修纂,也以此为指导方针。《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6]这段文字,体现了清廷凝聚宋学与汉学两派学术力量、整合以汉唐注疏与宋明理学为重点的儒学资源,加

论元代“续兰亭会”

邱江宁 宋启凤

内容提要 元末至正庚子年(1360),由浙江地方官刘仁本在时属绍兴的余姚秘图湖畔零咏亭上主持召开“续兰亭会”。“续兰亭会”从内容到形式再到精神内涵都有接续东晋“兰亭会”的意思。这既与刘仁本个人的兴趣有很大关系,又与元代兰亭书学文化、雅集文化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更与元末南北对峙、东南士流心系大都、力图恢复社会秩序的愿景密切相关。

关键词 元代 续兰亭会 刘仁本 兰亭会 兰亭书学文化 雅集文化

邱江宁,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321004

宋启凤,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321004

在王羲之于永和九年(353)三月上巳日举行兰亭雅集,有了 37 首题和诗以及著名的集书法与文学极品于一身的《兰亭集序》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从此平添了许多江南元素和士大夫的高旷、清雅之气。值得注意的是,在兰亭雅集文化成为传统精英士大夫文化一部分的过程中,人们对元代雅集文化,尤其是发生于 1008 年后、元末至正庚子年(1360)由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刘仁本主持的“续兰亭会”极少注意。令人深感文化环节的断链与缺失。以此,元代刘仁本主持的“续兰亭会”及其与元代雅集文化的关系及影响非常值得探究。

一、元代“续兰亭会”召开的背景

元代“续兰亭会”召开于元末至正庚子年(1360)

浙江余姚,这既与绍兴当时在全国特有的安定环境有密切关系,又与主持者刘仁本的个人气质兴趣表里呼应,同时还与元代一直盛行的雅集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

“续兰亭会”的召开与元末绍兴的偏安东南有密切关系。至正十九年(1359),在全国战事一片紧张的形势中,驻守绍兴的元军与明军展开了一场大战。战争最终以元军胜利,明军退去而告终。此后,绍兴一直比较安定,没有受到大的战事滋扰,“保守八年”,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元王朝覆灭前两年,绍兴归属明军。绍兴在乱世中暂时安稳的“飞地”^[1]性质使得文人们纷纷避乱绍兴,这才得以形成当时雅集规模甚大的“续兰亭会”,从而成就了绍兴在元末江南地域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地位。

本文获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二等资助(20100470468)。

欧洲楚辞研究综述

陈 亮

内容提要 本文分三阶段对楚辞在欧洲的传播史进行梳理。二十世纪以前为早期研究阶段。我们发现明清来华耶稣会士研究与翻译楚辞的史料,将楚辞西传的历史前推 200 多年。该阶段的代表作是费茨梅尔、德理文和理雅各的译本。二十世纪上半叶为现代研究阶段。楚辞成为欧洲大学汉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内容,学者间的讨论与争鸣增多,世界范围的楚辞研究圈形成。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为当代研究阶段。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楚辞研究异军突起,西欧国家出现全译本,楚辞研究取得多方面进展。最后归纳欧洲楚辞研究范式和发展方向,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出建议。

关键词 楚辞 屈原 翻译 欧洲汉学 文化传播

陈 亮,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讲师 226019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它与《诗经》并列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屈原开创的楚辞,不仅属于中国人民,而且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苏联汉学家费德林(Н.Т. Федоренко, 1912-2000)说:“屈原的诗篇诞生于民族的独特性,但具有普遍的意义而成了全人类的财富。”^[1]早在二千多年前,楚辞就流传到东亚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继而流传到欧洲。

楚辞在欧洲的传播,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笔重彩。我们通过调研发现,欧洲学者研究楚辞迄今约有 400 年历史,欧洲学者译介楚辞的文献资料有 200 余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荷兰语、俄语、波兰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捷克语在内的十几种文字。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

益频繁,回顾楚辞在欧洲的传播历程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了解欧洲的楚辞研究历史,给国内学术界提供一个参考系,一套新范式,一些新思路,而且有助于中外学术对话,推动经典外译,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楚辞在欧洲的研究史,根据时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以前为早期研究,二十世纪上半叶为现代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为当代研究。本文将追溯楚辞西译的历史,考察不同时期楚辞学的发展特点,介绍代表性论著。

一、早期研究:从引用词句到翻译介绍

目前学界把楚辞的西传开始时间初步定为 19 世纪上半叶^[2],然而我们从中西交通史中钩沉到更早

从润例看民国书画家经济意识的提升

陶小军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和传统文人生活境遇的改变,职业书画家的经济意识普遍得到提升,并集中体现在他们刊登的润例广告中。他们或利用名人效应,彰显自己在艺坛的地位;或斟酌文句,用语言的力量吸引读者注意;又或利用新的交易方式,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实际利益。这些行为不仅使书画家的生存问题得到解决,还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书画家经济意识的提升可以说是近代艺术改革的必要基础,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润例 民国 书画家 经济意识

陶小军,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210097

—

自宋元以降,文人士大夫一直是中国传统书画创作的主体,对于这些视科举为唯一正途的“准统治阶级”来说,书画艺术不过是读书之余消遣娱乐的玩物,大可不必过于认真计较。事实上,在文人群体里能够掌握一定的书画技能的往往都是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个中精英,他们多出身名门望族,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有时也会出卖自己的作品,但绝大多数都是购买者慕名而来,主动索求,一门心思考虑经济效益的,可谓少之又少。然而到了民国时期,这一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专制王朝的覆灭使得为文人阶层敞开了千余年的仕官大门骤然关闭,而动荡的时局又一次次冲击着他们原本倚仗的家族基业,许多文人不得已只得重新认识自

己所掌握的书画技能的价值,投身社会变为职业书画家。在这种情形下,书画交易已不仅仅是买和卖的关系,怎样尽可能地获得利益,以支撑其生存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发展是每一个书画家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文人们开始培养出了经济意识,他们所制定的润例便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在民国时期,润例多数是刊登在各大杂志、报刊上的,它不仅仅是书画家书画价格的标准,还极具有广告效应。逐渐了解其中奥妙的书画家们围绕着润例的广告性质,开始大做文章。

二

作为艺术品的书画作品,其性质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特殊性,它的价值标准很难有统一的规范,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界内人士主导的评论界,因此名人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民国书画市场研究”(项目编号 13LSB008)阶段性成果。